

论军队在埃及变局及其政治转型中的作用

朱泉钢 王林聪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军队一直是影响埃及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伴随着埃及近代历史进程,军方形成了独特的团体性特征,其表现为团体意识、利益特殊化和独立决断能力,由此决定埃及军方在政治和社会变革时期的决策倾向和行为方式。中东变局发生后,埃及教俗之间的对峙、军方与文官政府(穆尔西时期)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但是,军方仍直接或间接主导着埃及政治转型进程,其作用具有双重性:既是维护埃及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力量,对于防止社会分裂、保证社会秩序、结束政治混乱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作为特殊利益团体,其行动逻辑乃是明显维护军方特权地位。从长远看,此状况将会阻碍埃及民主化进程,甚至损害民主发展的质量。

关键词 埃及 军队 团体性 转型

作者简介 朱泉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西亚非洲系博士生(北京 102488);王林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7)。

20世纪中叶以来,军队在埃及政治发展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体现在民族国家建设、内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政权更迭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埃及在2011年“一·二五运动”中,军方迫使穆巴拉克总统下台,进而走向政治前台,诱发人们对埃及军队行为方式的思考。2013年7月3日,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宣布中止宪法(2012年制定),解散议会,罢黜民选总统穆尔西,提前举行总统选举。2014年3月26日,塞

西公开表态参加即将举行的埃及总统大选。由此引起人们对军队作用的关注，同时也彰显军队在埃及变局和政治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因此，究竟如何看待埃及军队的地位，特别是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军队在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乃是本文探究的主要问题。

埃及军方团体性特征的形成

不同于传统军队，现代军官团是一个专业团体，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其特质，专业主义的显著特征包括专业技术、责任感和团体意识三方面。^①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军方而言，虽有类似西方国家军方的专业技术和责任感，但两者在团体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因而，军方团体性（Military Corporateness）对于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在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军方团体性被亨廷顿界定为军官具有的团体特征，作为团体，军官拥有凝聚一体的意识，这种意识将军官与行外人群体区别开来，既禁止团体成员将专业技能运用到不相干的领域，又避免外行人干预军官的专业行动。^②显然，不同国家的军方团体性具有不同特征。在西方国家，军方具有专业自主性和非政治性，并通过相关制度规定影响国家安全事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军方往往参与和专业技能并不相关的领域，例如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进而在相关领域形成团体利益和自主性。^③埃及军方亦如此，它除了负责传统保家卫国的职责之外，还承担专业技能之外的诸多任务。^④埃及军方的团体性具有3个重要特征：第一，军方成员具有凝聚一体的团体意识，他们认为军官有别于其他群体；第二，军方具有独特的团体利益，有时军方利益与文官政府的利益并不一致；第三，军方具有独立于文官政府的自主性，这是确保军方独立行动和保护自我利益的前提。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 - 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8 - 10.

② Ibid., p. 10.

③ Alfred Stepan, "The New Professionalism of Internal Warfare and Military Role Expansion", in Alfred Stepan eds., *Authoritarian Brazil: Origins, Policies and Fu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④ Hillel Frisch, "Guns and Butter in the Egyptian Army",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 No. 2, Summer 2001, p. 9.

埃及军方的团体性特征源自埃及军政关系的发展历史。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三任总统时期的军政关系显示出不同特征，军政关系的演进塑造了埃及军方的团体性特征。在1952年革命胜利到1970年纳赛尔逝世这段时期，埃及是军人政权。“七月革命”的领导军官长期掌握政府权力，占据政府要职，主导政治进程，设置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主要议题，制定外交、安全与军事政策，纳赛尔时期的埃及政治生活具有深厚的军人色彩。^①从1970年萨达特继任总统到1981年他被伊斯兰激进分子刺杀期间，埃及军队的专业化程度在加强，政府的文官色彩渐浓，文官政府控制军队的能力显著提高。^②这一时期，由于萨达特总统有意识地限制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随着埃及和平条约签订，埃及摆脱战争困扰，从而使军队在政治系统中的影响下降，军队与文官政府的分离基本确定。与此同时，军方自主决策能力加强，对自我利益的界定和维护更加明确。^③1981年到2011年穆巴拉克总统执政期间，军队专业化程度进一步增强，军方团体利益更加突出和明确，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成为重要利益集团之一。实际上，从1952年自由军官领导“七月革命”以来，埃及军政关系发展进程最终形塑了军方独特的团体性特征，其表现为团体意识明确化、团体利益特殊化、团体行动自主化。

埃及军方的团体意识体现在军方将自己视为埃及民族主义的代表，军队是埃及共和国的创立者、建设者和保卫者。^④长久以来，埃及军队的民族主义形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在对内方面，实现应征士兵的社会化，通过军事教育促进社会发展，加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促进技术扩散及工业化，消化剩余劳动力，发挥经济作用，保护社会秩序及政权机构；在对外方面，遏制、防御或击败外部敌人，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性袭击。^⑤现代埃及的奠基人阿里是军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者奥拉比是军人，

① Ahmed Hashim, "The Egyptian Military, Part One: From The Ottomans Through Sadat",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VIII, No. 3, Fall 2011, p. 68.

② 王林聪著：《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③ Imad Harb, "The Egyptian Military in Politics: Disengagement or Accommodatio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7, No. 2, Spring 2003, pp. 282 - 283.

④ Audie Cornish talks to Steven Cook, "Egypt's Military 'A Builder, A Liberator And Savior'",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200823438>, 2013-07-10.

⑤ Birthe Hansen and Carsten Jensen, "Challenges to the Role of Arab Militaries", in Carsten Jensen eds., *Developments in Civil - 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Copenhagen: Royal Danish Defence College, 2008, pp. 29 - 30.

共和国的缔造者纳赛尔也是军人。军队领导埃及人民推翻君主国，建立共和制度，引领埃及走向独立和发展之路，并且在埃及的国家建设中承担重要角色。^① 军队参加了四次中东战争，有力捍卫了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更重要的是，在历次埃及国内动荡中，军队都是维护国内秩序的决定性力量，这些凸显了军队作为国家主权、安全和尊严捍卫者的身份象征，也强化了军方的团体意识。

埃及军方具有特殊的团体利益，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军方具有两种类型的利益：核心利益和次要利益。具体而言，军方的核心利益体现在维护军方的经济利益，参与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影响政府机构设置。次要利益包括对军队有影响但并不必然损伤军队利益的特定制度制定或修订。^② 当军方认为特定情形威胁到军方的核心利益时，军方必然会做出反应。埃及军方的经济利益涉及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工业生产部门到服务业部门，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日常生活用品生产，从企业到医院和教育机构，可谓无处不在。长期研究军队与埃及经济关系的开罗大学教授阿姆扎维（Amr Hamzawy）表示，军队控制着埃及整个国民经济的1/3，数额高达60亿美元。^③ 作为中东地区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埃及一直视自己为阿拉伯世界的盟主，军队在埃及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实施中具有重要作用，从阿以战争到反恐行动，埃及军队一直都处在斗争的前沿。埃及军方希望政府能够提供条件，确保军队在中东地区保持影响力。作为具有独特利益的专业化群体，军方希望能够影响埃及政治制度建构，包括能够影响军队的预算，与军队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机构领导任命，以及关键部门的政策制定，进而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

正是由于特殊的国家发展经历，埃及军方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具有独立于文官政治系统的自主性，从而使军方有机会和能力根据自身利益判断自主采取行动。在经济方面，埃及军队通过军事生产部，工业化组织和国家服务产品组织不断卷入经济生活，生产军用和民用产品。埃及军工企业招募大量劳动力，军官退休之后往往进入政府或经济管理部门，商人与军工部门保持紧

① 王铁铮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② Steven Cook, *Ruling but not Governing: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gypt, Algeria, and Turke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7 - 18.

③ Carl Finamore, "Revolution & Counter Revolution in Egypt: Military Power vs. Protest", <http://www.beyondchron.org/news/index.php?itemid=9871>, 2012-02-06.

密联系，军工企业还向贫苦民众低价甚至免费提供面包等生活必需品。更重要的是，埃及军队的经济活动并不在国家预算之内，且不受议会的监督和质询。^① 由此形成了埃及军队明显的自主性特征，并不完全受制于文官政府，如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库克（Steven Cook）所说，埃及军队就是一块独立的“飞地”。^②

由此可见，埃及军方的团体性特征是认识和分析军方在政治和社会变革时期决策倾向和行为方式的重要依据，这些特征及其作用同样反映在埃及变局中。

军队在埃及政治变局中的表现

在阿拉伯剧变的历史大潮影响下，2011 年 1 月 25 日，大量埃及抗议者涌上街头，表达对穆巴拉克政府的不满，进而要求他立即下台。政府动用警察平息民众抗议，未能奏效，被迫于 1 月 28 日出动军队协助警察维持秩序。但是，军队介入并未恢复国家秩序，最终穆巴拉克下台，埃及进入政治转型时期。后穆巴拉克时期的政治过渡经历了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导时期、穆尔西当政时期、军方支持下的临时政府时期 3 个阶段，其中，军队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同时期表现不尽相同。

（一）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导下的埃及政治过渡

2011 年 2 月 11 日，统治埃及近 30 年的穆巴拉克总统在军方压力下黯然下台，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下面简称军委会）接管政权，开启了军方主导的埃及政治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埃及进行了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选举，确定了修宪程序，举行了总统选举和组建新政府等政治活动。2012 年 7 月 1 日，军方最终向民选的穆尔西政府移交权力，这标志着军委会监管下的埃及政治过渡时期结束。在这一年半时间当中，军队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军方被迫探索军队与国家权力的新型关系。长期以来，军队在埃及政治体系中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性，它不同于拉美国家、巴基斯坦等国的军

^① Robert Springborg, “Learning From Failure: Egypt”, in Tomas C. Bruneau and Florina C. Matei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ivil – Military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95.

^② Steven Cook, op. cit., p. 14.

队与特定的政治团体、官僚部门、宗教势力或宗教政党进行对话和结盟，进而保障军方利益。^① 库克在研究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三国军队在政治中的作用时指出：这些国家的军方通过影响国家的制度设计，确保其在政治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对国家的政治发展施加影响，实现了“统而不治”的地位。^② 在埃及的政治系统运转中，总统居于中心地位，总统通常都有着军人背景，即“脱下军装的将军总统”。一方面，总统赋予军队相当大的特权；另一方面，军队支持总统的权力和统治。但是，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埃及面临新的权力结构安排，特别是随着民选总统身份的变化——不一定具有军人背景，军方不得不重新考虑军队在政治权力中的定位问题。

第二，埃及军方利用其实力，影响新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建构，保证军方的团体利益。在“一·二五运动”之后，军方发现在新的政治体系中，不能再依靠总统维护自身利益，转而寻求通过影响新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安排，借此来保证军方的团体利益。无论是对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的重视，还是努力对司法部门施加影响，都显示出军方看重国家制度建设，并努力通过影响制度安排为自身行动寻求合法性，从而竭力对埃及新宪法的制定施加影响，要求新宪法尊重军方的意愿，反映军方的利益。综观埃及过渡时期的政治进程，军方依靠自身资源，通过影响新宪法的制定、司法部门的工作、过渡时期的制度安排等方式，影响埃及政治事务，进而保证军方的团体利益。这集中表现在：军方希望继续保有对外宣战的权利，确保埃及与以色列的“冷和平”状态，进而保证美国继续向埃及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军方希望维持独立控制国防预算的权利，而不愿意将此权利让予议会部门，因为控制国防预算能够充分保障军队的财政利益；军方希望文官政府保证军队团体及高级军官的经济利益，包括保证军队经营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军方对自身控制的资本和财产具有自由支配的权利。^③ 考察 2012 年年底颁布的埃及新宪法，军方的这些要求基本都得到了满足。

第三，埃及军方和伊斯兰主义者（穆斯林兄弟会）之间互不信任，双方

^① Yezid Sayigh, “Egypt’s Unfinished Revolution?”, January 28, 2012, <http://carnegie-mec.org/2012/01/28/egypt-s-unfinished-revolution/axnb>, 2012-01-28.

^② Steven Cook, *op. cit.*, p. 8.

^③ Chérine Chams E - Dine, “The Military and Egypt’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Preservation of the Military’s Reserve Domains”, SWP Comments, February 2013, http://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comments/2013C06_ced.pdf, 2013-02-25.

在过渡时期既有斗争，也有妥协。有学者指出，“一·二五运动”之后的埃及政治生态主要由自由主义力量、军队、伊斯兰主义者三方之间的合作与斗争，以及分化组合所决定，^①但真正决定埃及政治进程的是军队和穆兄会之间的关系。作为埃及世俗主义力量的重要代表，军方一直对伊斯兰主义者不信任，伊斯兰主义者也不信任军队。穆兄会指责国家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对以色列过于友善，外交政策过于亲西方，而军方恰恰是这些政策的受益者。军方认为，如果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上台执政，军方的某些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军方担心伊斯兰主义者可能撕毁埃以和约，破坏埃及的世俗主义传统，对西方世界保持敌对姿态，这些是军方不能容忍的。

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的首次埃及总统选举可以视为军方和穆兄会既竞争又合作的一个缩影。2012年4月，埃及最高总统选举委员会宣布穆兄会代表沙特尔等人不具备总统候选人资格，这是军方限制穆兄会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年5月举行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呼声很高的持中间立场的自由派代表穆萨和福图赫却未入围第二轮对决，反倒是穆兄会的穆尔西和军方代表沙菲克在第一轮竞选中得票分居前两位，显示出穆兄会和军队在埃及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力。但是，两人得票率未超过总选票的一半，说明埃及民众至少有一半并不热衷于穆兄会和军方代表。鉴于第二轮总统选举中穆尔西获胜的呼声很高，为防止穆兄会在埃及政治舞台上一家独大，军方在第二轮大选之前采取未雨绸缪的举措，借助司法部门，宣布穆兄会代表占多数的人民议会非法。与此同时，当穆兄会的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军方表现出足够的克制和妥协，最终接受了穆尔西的胜选。

实际上，由于军方判断自身无法有效解决埃及的棘手问题，民众对军方主导政治过渡愈加反感，西方国家对军方退出政治施加更大压力，新的制度安排能够保障军队团体利益，军方最终决定还政于民选政府。

（二）军队在穆尔西政府时期的表现

穆尔西执政期间，利用自由正义党在立法和行政部门中的多数派地位，积极扩展穆兄会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作用，加强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一方面，整体上保证军方团体利益；另一方面，寻求机会削弱军方权力。而

^① Eric Trager, "Egypt after Mubarak: A Triangular Power Struggle Emerges", July 24, 2011, <http://www.thecuttingedge.com/index.php?article=52441>, 2011-07-24.

军方虽对穆尔西亲伊斯兰政策并不满意，但整体上保持谨慎与克制。

穆尔西上台初期，对军方表现出友好的姿态，尊重军方的团体利益和自主性；军方则在多数场合显示出对总统的支持。^① 例如，穆尔西胜选的首次全国讲话就表达了对军队的感谢。穆兄会主导下的立法和行政部门，并未公开削弱军方权力，军队的预算依旧不受议会和公众监督，商业领域的特权地位得以维持，由军官主导的国防委员会依旧主导着军队的相关事务。当然，军方也表达了对穆尔西总统的支持。国防部长塞西多次邀请穆尔西出席军方组织的活动，包括军方的纪念活动和军事项目的启动仪式等。塞西还多次表示，军队不会干预政治，主要致力于保卫国家的内外安全。

与此同时，穆尔西总统力图加强对军队的控制。2012年7月8日，穆尔西下令伊斯兰主义占优势的人民议会复会，这显示出穆兄会并不甘愿在军方主导的政治生活中充当配角的决心。但是，支持军方的埃及最高宪法法院7月10日裁定，中止执行穆尔西8日发布的重启议会工作的总统令，这表明军方仍然会通过司法等制度途径影响埃及政治生活，应对总统削弱军方的举动。8月初，穆尔西利用“西奈袭击事件”果断更换军方高层，坦塔维和阿南等前穆巴拉克时期的高级别军官被礼节性地解职。少壮派军官塞西和苏卜希上位，由于这两人也是军委会成员，穆尔西的举动既能加强文官政府对军队的影响，又能保证不严重伤害军方的利益，^② 这一事件显示出埃及军方与文官政府关系斗而不破的特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方与穆尔西总统的分歧逐渐加大。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导致西奈半岛的安全形势逐渐恶化，军方认为穆兄会和哈马斯应对此负责，并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反恐行动，但穆尔西制止了军队针对极端力量的强硬政策，军方对此并不满意。2013年6月中旬，穆尔西在并未征求军方意见的情况下，宣布埃及人民和军队打算通过支持反叛力量推翻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塞西等高级军官对此十分不满。最后，面对民众的持续抗议，穆尔西命令军队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塞西拒绝了该命令，并指出民众有自身的

^① Zeinab Abul - Magb, "The Egyptian Military in Politics and the Economy: Recent History and Current Transition Status", CMI Insight, Vol. 2013, No. 2, p. 3.

^② 唐继赞：《穆尔西复兴埃及的举措及其面临的挑战》，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10期，第24页。

要求，双方的相互谴责逐渐加剧。^① 鉴于军方将自身定位为国家的最终监护者，这些分歧促使军方考虑在穆尔西政府无力维持埃及政治稳定时进行干预。穆尔西政府在执政的一年多时间里，经济发展成效不彰、政治安排缺乏宽容、社会思潮分歧严重，这些问题引起了大规模的民众不满和抗议，并最终导致了军队的政治干预。

2013 年 4 月，埃及一群年轻人发起了“反叛运动”，要求穆尔西下台和提前进行总统选举。这个运动经过数周的签名活动，获得了 2 000 万民众的支持。穆尔西错判了形势，他认为反对派不过是乌合之众，不会对政府构成严重挑战，因而一直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谈判姿态。反对派在 6 月 30 日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宣称如果总统不立即辞职，将进行民众暴动。穆尔西拒绝了这些要求，穆兄会组织了支持穆尔西的示威活动，国家陷入冲突状态。面对埃及的混乱局面，埃及军方于 7 月 1 日向穆尔西和反对派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并在 7 月 3 日罢黜穆尔西的总统职务，并将他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

（三）军方表现之比较：“一·二五运动”与“七·三事件”

仅仅从“七·三事件”并不足以使我们充分理解埃及军队。通过比较军方在这次事件与“一·二五运动”中的表现，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埃及军方决策倾向和行动方式的理解和认识。

在这两次事件中，埃及军方的行事方式展现出一定的相同点。第一，军方展现出对秩序的偏好，显示出军队是埃及稳定的最终维护者。埃及军方通常会就对政治失序局面做出回应，政治秩序稳定对于军方的利益具有重大好处。^② 埃及军官偏爱秩序，军方在埃及历史上的行动显示了军官对于无止境的示威活动并没有太大耐心。^③ 在“一·二五运动”中，军方的表现不仅反映了对待抗议民众与穆巴拉克政权的矛盾心态，而且反映出军队作为埃及国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2011 年 2 月初，军方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军队会保持中立而不偏袒，如果军队保护任何一方，我们将被另一方视为偏颇……”

^① Hamza Hendawi, “Disputes between Morsi, Military Led to Egypt Coup”, http://www.denverpost.com/rawnews/ci_23679782/disputes-between-morsi-military-led-egypt-coup, 2013-07-18.

^② Steven Cook, *Ruling but not Governing: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gypt, Algeria, and Turkey*, p. 18.

^③ Steven Cook, *The Struggle for Egypt: From Nasser to Tahrir Squa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99.

我们的作用是通过使对立集团分开，防止冲突和混乱。^① 同样，2013年6月23日，塞西的声明显示出军队希望国内秩序保持稳定，他警告说：“军队是有道德感和充满爱国情感的群体，我们有责任避免埃及滑向内部混乱，派系冲突，国家崩溃的深渊”。^② 在两次事件当中，军队都被部署在抗议活动激烈的地区，以阻止可能出现的暴力冲突。埃及军队和装甲车辆还驻扎在开罗及其他地区一些重要设施周围，如火车站、博物馆、主要政府机构和银行，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总之，军方将自身定位为埃及国内秩序的最终维护者，当社会冲突加剧的时候，军方通常会做出回应，保证国家回归正常秩序。

第二，军方表现出从半心半意支持现政权到进行干预的行动变化。在“一·二五运动”中，军方起初并没有表现出明确不支持穆巴拉克政府的姿态，军队反复敦促民众尽快返回家中，恢复正常生产，军方将确保政权依照宪法程序实现民主转型。然而，面对民众的持续抗议，军方在2011年2月初表明了不会以武力镇压示威民众的立场。这显示出军方的犹豫，既想要说服民众停止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抗议活动，又不愿意采取强力举措镇压民众。随着抗议活动的进一步升级，军方最终出手干预，迫使穆巴拉克下台。在2013年的“七·三事件”中，塞西出席6月26日穆尔西对埃及民众的讲话，对于军方来说，这证明其仍旧将自己视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至少显示出军方对穆尔西政府的部分支持。面对民众的持续抗议，军方在7月1日呼吁政治各方在48小时内解决政治危机，满足人民的意愿，否则军队将设定埃及未来政治的路线图。遭穆尔西拒绝后，军方最终在7月3日进行干预，罢黜穆尔西总统。显然，埃及军队干预行动并非持“阴谋论”观点的学者所称，具有打压穆兄会的详细战略。两次事件中，埃及军方起初都显示出半心半意的支持现政府，因为这些政权基本保证了军方的团体利益，^③ 当军方发现现政权面临倒台的重大风险时，军方便选择主动干预，试图以维护埃及国家和人民利益为旗号，影响未来的政治转型，保证军方的团体利益。

另一方面，埃及军方在“一·二五运动”和“七·三事件”中的表现也

^① CNN wire staff, “Key Members of Egypt’s Ruling Party Resign”, February 5, 2011, <http://edition.cnn.com/2011/WORLD/africa/02/05/egypt.protests/index.html?hpt=T1>, 2011-02-05.

^② Jeffrey Martini, “The Egyptian Military’s Playbook”, <http://www.rand.org/blog/2013/07/the-egyptian-militarys-playbook.html>, 2013-07-02.

^③ Sharon Erickson Nepstad, “Mutiny and Nonviolence in the Arab Spring: Exploring Military Defections and Loyalty in Egypt, Bahrain, and Syri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0, No. 3, 2013, p. 338.

有明显不同之处。第一，军方干预的对象及其策略方式不同。2011年2月11日，军方迫使世俗威权统治者穆巴拉克总统辞职，并组建军委会管理国家事务。穆巴拉克总统时期，军方与政府是一种互惠关系，政府尊重军方的团体利益和高级军官的私人利益，军方也利用自身地位和权力支持穆巴拉克政权，埃及军方接受军队相对于文官政府的附属地位，在确保军方利益的同时远离政治。^①“一·二五运动”时期，军方则以温和方式切割与穆巴拉克政权的关系以保证军方的团体利益。相反，“七·三事件”，军方则采取强制方式，从废黜穆尔西到武力清场行动，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第二，军方进行干预之后建立的统治模式不尽相同。“一·二五运动”之后，军方建立军委会，进行直接统治；“七·三事件”之后，军方迅速将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进行间接统治。“一·二五运动”之后，埃及成立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军委会，主导埃及政治转型，军队在过渡时期整体上维护了埃及社会的稳定，但恶化了军队形象。为了维护秩序，过渡政府加强了对媒体舆论的控制，强化了对示威活动的监管，迟迟不废除紧急状态法，拖延对穆巴拉克政府时期官员的审判，一些埃及民众认为军方从埃及革命的英雄变为埃及革命的敌人。2011年1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43%的埃及民众认为，军方逆转了埃及革命的成果。^②相比之下，军方在2013年表现得更加谨慎，军方首先发布了最后通牒，然后才采取行动。此外，干预之后，军方迅速拉拢支持者，包括爱资哈尔谢赫、萨拉菲派、科普特人、自由主义者、青年群体等政治力量，加强军队行动的合法性。同时，军方迅速将国家最高权力移交给埃及宪法委员会主席曼苏尔，并由后者出任总统，军方退居幕后，试图显示军队与文官政府保持距离。^③这样既能保证军方对埃及政治局势的发展产生影响，又能减少民众对军方直接主导政治的不满。

通过比较埃及军方在“1·25运动”和“7·3事件”中的表现，可以看到，军方在面临紧急状态时，往往根据自身利益需要自主采取行动，这进一步揭示了埃及军方的团体性特征。

^① Imad Harb, "The Egyptian Military in Politics: Disengagement or Accommodatio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7, No. 2, Spring 2003, pp. 285 - 286.

^② "43 per cent of Egyptians say SCAF Working to Slow or Reverse Revolution",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27472.aspx>, 2011-11-24.

^③ Shibley Telhami, "What just happened in Egypt?", <http://blogs.reuters.com/great-debate/2013/07/04/what-has-just-happened-in-egypt>, 2013-07-04.

军队在埃及变局和政治转型中的作用

如前所述，“一·二五运动”以来，军队在埃及变局及其政治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军方的行为既体现其团体性特征，又反映了国内各种力量对比及其变化。“一·二五运动”以来各种力量较量及其结果表明，军方实际上决定着现阶段埃及变局和政治转型的走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埃及政治生活的“总节制阀”。^①

首先，军方干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埃及政治力量的格局。“七·三事件”标志着军方重新回归政治权力中心，军队干预改变了埃及的政治生态，教俗力量对比状况发生新的变化。穆尔西总统被军方废黜后，军方果断采取行动打压穆兄会，关闭其媒体宣传机构、逮捕其核心成员、冻结其资产、威慑其支持者、解散其注册的非政府组织。面对军队的强制行动，虽然穆兄会的中低层成员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但其领导层依旧坚持非暴力的抗议活动，显示出和平的意愿，这也为其参与未来政治进程留下了空间。即便如此，穆兄会组织和动员能力被削弱，社会形象恶化，领导力量分散，其政治影响力大大降低。

在“七·三事件”中，萨拉菲主义的第一大党光明党选择了站在反对穆尔西阵营一方，作为同是伊斯兰力量的萨拉菲是否会抢占穆兄会的民众支持基础尚不确定。萨拉菲成员在2012年议会选举中，令人惊奇地获得了25%的选票，显示了其不容忽视的社会支持度，但是，在接下来的政治转型中，萨拉菲能否继续获得民众支持仍值得怀疑。^②其保守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吸引力仍然有限，更为重要的是，萨拉菲面临着内部分裂。2013年初，光明党党魁加福尔（Imad Abdul Ghafour）辞职，组建新的政党祖国党，显示出组织内部的不团结。

就世俗主义者来说，穆巴拉克时期的政治联盟可能重新回归埃及政治舞台，但自由主义者的影响力仍然有限。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其统治联盟参与政治受到限制，执政党民族民主党被解散。然而，这些力量并未受到彻底清算，仍有其强大的政治资源。“七·三事件”后，2013年8月，过渡政府任

^① 王猛：《后威权时代的埃及民主政治建构：回顾、反思与展望》，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3期，第63页。

^② Mona Alami, “The Salafi Choice”,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sada/2013/06/04/salafi-choice/g89d>, 2013-06-04.

命的新省长中，大多与穆巴拉克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举意味着穆巴拉克时期政治力量重新被纳入统治系统。相反，自由主义者虽然在政权变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在埃及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微弱，其批判能力大于建设能力，尤其是不能将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信条与国内现实密切结合起来。因此，对于埃及这样一个贫困的国家来说，大多数民众更加需要的是解决生存问题。事实上，自由主义者多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精英，但他们与埃及社会联系有限，民众基础薄弱，因而无法建立有效的宣传动员组织。此外，自由主义者相互分散，无法形成有效合力，从而影响埃及政治生态。可见，埃及变局在经历了 3 年的较量之后，伊斯兰政治力量遭受重创，自由主义力量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阵营，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集团“一枝独大”，重新控制埃及政局。

其次，新宪法的制定进一步明确了军方地位的特殊性，从而赋予了军方施加其影响的合法途径。衡量军方地位状况的重要指标是宪法中关于军队地位和作用的规定。鉴于此，埃及变局与政治转型期间，军方通过影响国家制宪、立法、行政和预算诸权利来保证其既得利益。即使在穆尔西总统强行推动的 2012 年宪法中，军队的地位仍然得到充分的保障。

穆尔西总统被罢黜后，经过新一轮的政治斗争，军方利益在立法和司法领域进一步得到保证。2014 年 1 月，埃及新宪法经全民公投获得通过，宪法中关于军队在国家中地位和作用的条款进行了修订，不仅军方的团体利益得以维护，而且其自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① 其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保障军队地位的独特性。《2014 年宪法》第 234 条规定，在宪法通过后的两届总统任期（8 年）内，军委会负责任命埃及国防部长。显然，这一规定显示出军方在国防事务中对总统的优先地位。第二，军队权力的独特性。在争议较大的军事法庭权力方面，宪法最终规定军队有权通过军事法庭审判平民，而不必通过必要的司法程序，这无疑加强了军队的司法特权。第三，确保军方利益的独特性。《2014 年宪法》再次规定了军队预算的秘密性。由此可见，在军方主导下，《2014 年宪法》制定和实施从根本上维护了军方在政治、司法乃至经济等领域的独特地位。

^① Nathan J. Brown and Michele Dunne, “Egypt’s Draft Constitution Rewards the Military and Judiciary”,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12/04/egypt-s-draft-constitution-rewards-military-and-judiciary/gvc8>, 2013-12-04.

再次，埃及军方对政权的再度介入，反映了军政关系的新变化。穆巴拉克总统执政时期，随着技术官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埃及军政关系的变化趋势是文官政府的特点明显增强，军人在政治权力中的核心地位有所弱化。因此，穆巴拉克时期的权威政权不能简单地视其为军人政权，而是具有“半文官政权”性质。但是，“七·三事件”以来，这一趋势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转，军方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在政治转型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除了宪法赋予的权力外，其典型事例反映在：一是行政领域，许多退休将领纷纷出任省市地方高官；二是军方领导人国防部长兼副总理塞西参选埃及总统。据佐格比民意调查机构（Zogby Research Services）2013年9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有46%的埃及民众对塞西表示信任。^①随着埃及安全形势的恶化，目前塞西的民意支持可能更高。

2014年3月26日，埃及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塞西发表讲话，宣布辞去最高军事指挥官，竞选埃及总统。根据目前埃及政治力量对比状况看，预计塞西可能轻松赢得大选。塞西参选或当选总统，必将对埃及政治转型产生深远影响。第一，军方重新回归埃及权力主导者地位，埃及军政关系的砝码明显偏向于军方。第二，埃及教俗关系格局呈现重大变化，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主义力量占据优势，并主导埃及政治转型；^②而伊斯兰主要力量随着穆斯林兄弟会遭受打击和非法化，目前已受重挫并陷入低迷。第三，从中东变局的整体态势看，埃及军方干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东变局的走向，伊斯兰政治力量在中东地区问鼎权坛的势头受到遏制。

然而，塞西参选或当选是否意味着埃及重返权威政权统治或者军人政权？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从“一·二五运动”以来，埃及民众权利意识迅速觉醒，很难想象经过“一·二五运动”洗礼的埃及民众愿意重新回归权威政权治下。目前，埃及民众之所以寄希望于塞西，表达对塞西的支持，其实质上是期盼稳定和发展。换言之，民众的选择是为了稳定和发展，而非独裁。另一方面，即使塞西当选——即军方背景的领导人重新主宰埃及政坛，摆在他面前的任务仍然是最紧迫、最艰巨的民生诸问题。这些问题盘根错节，积

^① Zogby, “Egyptian Attitudes September 2013”, <http://static.squarespace.com/static/52750dd3e4b08c252c723404/t/5294bf5de4b013dda087d0e5/1385480029191/Egypt%20October%202013%20FINAL.pdf>, 2013-09-28.

^② 王林聪：《埃及政治转型的困境和出路》，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11期，第35~38页。

重难返，很难一蹴而就。因此，埃及能否走出当前的困境，绝非一日之功，更非通过一次选举就可以改变。

从目前埃及国内各种力量格局看，军方的强势地位毋庸置疑。塞西竞选总统虽然会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但仍很难满足民众对改善民生困境的期许，执政前景受到诸多因素制约。第一，由于军方和穆兄会的尖锐矛盾，双方都未表现出和解的姿态，未来的教俗关系将制约塞西的执政。埃及民主实践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选举，而是主要政治力量学会如何共处，协商解决争议，达成共识。在一个缺乏共识的国度中，选举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化，造成民主乱象。^① 穆兄会虽然受到严厉限制，但这个有着 80 多年发展史的组织很难被驱逐出埃及政治舞台，穆兄会依旧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因此，塞西当选必将面临来自穆兄会的挑战。第二，埃及能否与其他国家机构保持良好的关系，对塞西仍是新的考验。目前看来，军队对塞西的支持是明确的，但是，由于军队独特的团体性特征，未来总统和军队的关系究竟如何仍有待观察。此外，埃及司法机构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否得到司法机构的支持是总统合法行使职权的重要环节。因此，塞西当选之后埃及政权稳定与否还取决于其他重要机构的支持。第三，伴随着中东剧变，民众的政治诉求被激发出来，民众政治参与愿望空前高涨，一旦民众诉求未能得到满足，就会诉诸街头抗议，“重回广场政治”。^② 因此，如果埃及新政府仍无法有效解决民众关注的问题，塞西的支持率可能会急剧下降，民众或许仍将诉诸街头抗议，要求政府改变现状或迫使政府下台。

由此观之，埃及军方地位上升是一回事，能否解决当前埃及困局则是另一回事。而后者决定着军方的前途和命运，否则，埃及就会重蹈穆巴拉克执政后期的覆辙。

军人干预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不发达的产物。军人干预在不同时期其作用亦不尽相同。综观军人在埃及变局和政治转型时期的表现，可以看出，军队

^① John Judis, "Egyptian Roulette: How Should U. S. Policymakers Respond to Cairo's Worsening Violence?",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07/09/egyptian-roulette-how-should-u.s.-policymakers-respond-to-cairo-s-worsening-violence/gelw>, 2013-07-09.

^② 哈全安、张楚楚：《从选举政治到广场政治：埃及穆巴拉克时代的民众政治参与》，载《西亚非洲》2013 年第 3 期，第 31 页。

依旧享有埃及政治体系中的“总节制阀”地位，军方直接或间接主导着埃及变局和政治转型进程。军队在埃及政治发展和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呈现着双重性，既有其维护国家稳定与秩序的积极的一面，又有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权威统治，阻碍变革的消极的一面。军方作为具有特殊利益的团体，其行动逻辑明显具有维护军方特权地位的特征，从长远来看，很可能阻碍埃及的民主转型。与此同时，军方对穆兄会的过分打压将使埃及的政治转型进程更加复杂，军人能否担负埃及政治转型的主导力量，掀开新埃及的一页，仍然是未知数。

On the Military's Role in Upheaval and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Egypt

Zhu Quangang & Wang Lincong

Abstract: The Egyptian milita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for a long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yptian military shows the unique corporateness characteristics: autonomous decision - making capacity, special group interest, and group consciousness, which determines the decision - making and behavior tendencies of the Egyptian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fter the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Egypt faces secular - religious confrontation and civil - military contradiction, however, the military still dominates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process in Egyp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ts role is twofold: on the one hand, the milita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rce in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in Egypt, it plays a role in preventing social fragmentation, ensuring social order and ending political chaos; on the other, as a special interest group, it acts for maintaining the privileged position of the military. In the long term, it could impede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even undermine the quality of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Egypt.

Key Words: Egypt; Military; Corporateness;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